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粮补给的军事近代化困境

姜 涛

【摘 要】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逐步建立起了一套符合近代化军事理念的后勤体制。战前军队军粮通常就地征发,战时则由后方办理,向前方部队补给。与此同时,军粮配拨权力逐渐收归中央,更便于统筹与调剂。理论上,各级兵站与军粮局设立后,军队可专心练兵、作战,不必参与军粮的配拨、征集、移交、补给诸环节。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地方粮政部门、军粮局、兵站以及各部队间难以协调,在体现军事近代化的后勤体制下,国民党军军粮补给反陷入困境。国民党军队后勤补给运作的失灵,使前线部队士兵温饱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严重影响国民党军战斗力。

【关键词】国民党军;军粮;后勤补给;兵站;士兵生活

【作者简介】姜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原文出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2.3.130~143

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生物机体运行的供能保障。在战争年代,粮食的地位更为突显。一方面,士兵行军、做工事、战斗都需要消耗大量体力,势必要摄入更多的食物。而从近代营养学的角度出发,士兵的口粮不能仅仅满足果腹之需,还要含有更高的卡路里、更丰富平衡的营养元素。另一方面,战时军队是否能高效地获取粮食,在关键时刻往往决定着战场上的成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作战效率高、士气旺盛的部队,往往每一位士兵不仅自带携行干粮,以备紧急情况下食用,而且在作战间隙,后勤保障部队还能将热食送至前线。兵粮军食及其补给在战争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熟悉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者对军食、军粮等关键词并不陌生。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频繁被诟病的问题之一便是军粮匮乏,士兵食不果腹^①。不过,既往研究多是从后方的军粮征购、征借着手^②,或是军粮、公粮一并讨论^③,实际并未落实到军队与士兵层面。国民党军队在作战间隙是如何获取军粮的,是后勤补给还是就地采买,抑或其他补给方式?普通士兵吃得如何?诸如此类问题,由于资料较为零散,目前仍没有较详细的讨论。美军二战战史中关于军粮补给、士兵口粮等研究论述已极为细致,而如

今方兴未艾的中国抗战史研究中,国民党军军粮补给的专题研究仍付诸阙如。

一、近代后勤体制的建立与战时军粮配拨的中央化

军事后方勤务(一般简称“后勤”)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武装冲突中战线拉长后的产物,其核心则是西方国家近代工业化后,交通技术的突飞猛进与整个社会组织力、动员力的提高^④。而在前近代农业社会的中国,给军队配套后勤体系的基础仍较薄弱。更为关键的是,抗战前,中国军队的地方性极强,机动性又较低,军队中央化远未完成,蒋介石嫡系中央军、桂系军、晋军、西北军、东北军、川军等仍是各自为政。军队一盘散沙的隐性后果之一,便是后方勤务发展落后于军队自身建设。军队吃粮需求也是各军在其控制的有限地域内自行筹措。绝大部分军队没有所谓“后方”的概念,也没有后勤补给需求。抗战前,中国军队在开拔行动前,往往会在粮食较为充裕的驻地再滞留多日,赶办士兵随身携带的军粮,一旦离开驻地便可能多日无粮补充^⑤。

抗战爆发后,桂系军首领白崇禧曾就军队后勤的缺失论述如下:

中国军人有一种不良的风尚,即以为军人在前

方才是好的,前进的,积极的,在后方就是不好的,老大的,消极的;基于此种错误的观念,于是大家都重视作战指挥,而忽于后方勤务的工作。固然这也有历史上的原因:因为近几十年来的战争,多系内战,内战所使用的兵器兵种,都非常简单,部队的单位也小,作战的活动面积也有限,而且更没有所谓立体作战,所以在给养方面,大家都可以就地征发,这种“就地征发”的勤务,而且是一种无组织的无技术的无统计的干活。^⑥

长期割据内战导致后方勤务被严重忽视,而军粮补给又是后勤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抗战前,无论是蒋系部队还是各地方军系,士兵所吃军粮并没有后勤部门协助送上前线,而是大多由司令部发给米津,令部队就地征取。例如,二次北伐前,蒋曾电令预备参战各部队,因米津已发,粮食须自行筹划。实在困难时,才能由所属兵站代为筹办运解。而当时部队与其所属兵站相距较近,实际上仍是就地征发,只不过让兵站代劳而已^⑦。又如,粤军在抗战前各部队补给按编制定额,由粤军总部定量发给代金,然后各部自行向市场采购。“作为伙食的粮秣,作为工资的款项,也是和蒋介石及其他派系的部队一样,混而为一,没有划分数量分发。”^⑧简言之,后方的司令部只管发钱,不管发粮。

七七事变爆发后,战区制度设立。军粮后勤补给始在战区制之下催生出基本的制度框架,主要体现在多级兵站体系上。在中央层面,军政部筹措成立后方勤务部(简称后勤部),统筹全国的后勤补给(包含但不限于军粮)。后勤部在战区层面设立兵站总监部,支援整个战区的补给;兵站总监部下又依次设立兵站分监部(集团军)、兵站支部(军)、兵站分站(师)、派出所(旅)^⑨。相较战前通常临时设立、层级单一的兵站制,这种多层次的自上而下的兵站体系是巨大的进步。一方面,在战区内,军粮补给沿兵站线,从后方逐级向前方输送,有了专业化分工的意味,权责也更加明确^⑩。另一方面,军粮补给的权力也借由后勤兵站体制收归中央。

抗战初期,中国失城陷地还不多,各战区统辖地域较为完整。当时,购粮囤粮也相对容易。加之,战前国民政府曾在重要战略地域囤积、储藏粮食^⑪,战

争爆发后又逐渐移交相应新设立的兵站,因此,兵站内囤有大量粮食现品,战区内各级兵站补给前方部队粮食的压力相对较小。1938年初,负责军粮集中采购的军政部军需署曾有统计,自抗战爆发截至当时,“共购大米一百数十万包,麦粉二百数十万袋,除有一二处存米尚未运完外,余均陆续随交后勤部领运前方各处,分屯配发”^⑫。1939年,后方勤务部各兵站共收到军政部转交所购军米,计130余万包,当时估计可敷整个军队3个月之用,即每月平均消耗军米40多万包(一包200斤)。不考虑国民党军人数增减,上述1938年初军需署统计的300多万包新购米麦,至少够全体官兵食用七八月之久。而1939年前,一般要求各战区控制可供该战区内部队食用3月的军粮,战区后方囤3月份,战区后方之总库再囤6月份^⑬。总之,由零散数据推测,当时后勤部控制军粮现品虽不充裕,但也大致可满足全国部队一定时期的食用需求。同时,兵站系统甫在各战区铺开,军粮现品由兵站发放的做法仍较为普遍^⑭。

然而,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国民政府控制的产粮区锐减。不仅民粮日蹙,军粮实物数量也逐渐减少。很快,通过兵站系统向前线部队发放军粮实物的规定越来越难执行。1939年初,国民党军军粮补给便已出现倒退至战前发放代金的情形。根据后勤部的材料,南昌会战时,后勤部仍能发实物,分别将修水、宜丰库米,及第九兵站总监部所囤干粮拨交作战部队食用。而1939年4月,随枣会战时,后勤部已改发代金,由部队自行采购,“在襄河西岸屯积之粮,供部队在作战时无法备办之用。又战区长官部负责采办之八万八千包,为备尔后作战之用,非万不得已,概不配发”,所囤余粮已消耗殆尽,需要另购粮食以备紧急时调用^⑮。

1939年,国民党军冬季攻势开始前,时任41师师长丁治磐除却布置作战任务、演练作战战术外,还时时关注本地米价。这间接表明,兵站已不能有效给予丁部粮食补给^⑯。丁治磐认为国民党军师级单位成了全能机关,不仅要作战,还要自己从市场上购米,一切皆是因为后勤系统之无能。冬季攻势开始后,丁治磐部在战斗中军粮无补给,狭小的作战地内购齐米面又极为艰难。是役之后,丁在日记中颇多

怨言,认为“国军人马给养皆须就地采买,渡河之后此实为一大问题,一面作战,一面在背水之小区域而人马众多之地采买,诚非易事”^①。

1939年底,军需署便有检讨承认兵站已不发实物:“(过去)作战部队,可按人数向所属战区领取大米(或面粉),继又有不领大米,则发米代金,本年(1939年——引者注)三月,乃明确规定每名月支米津二元。”发钱比发粮看似手续便捷,却使各经手人更易上下其手,“各部队如虚报人数,浮领米面,尚有不便携带,偷卖困难之顾虑”,发钱便可“径肥私囊”。发米津不仅增加各级人员腐败的风险,而且部队自行采购时,“在战区采购,自然困难万分,在后方采购,则又感运输不便”^②。部队拿钱采购,一方面会增加市场货币流通,另一方面,一旦不受纪律严格约束的武装人员向市场购买粮食。强买强卖之事在所难免,双重作用之下也会推高部队所在地域的粮价^③。

1940年,大后方粮价飞涨,前线部队获取军粮更是难上加难,实物补给缺失,有限经费(米津)又无法采买足够的军粮。为保证军队最低限度的军粮,同时防止军队向地方低价强买引起骚乱,国民政府将军粮补给体系再次升级,先后推行:(1)田赋征实政策(开源);(2)粮饷划分政策(士兵饷归饷,粮归粮,保证军粮实物发放);(3)设置军粮局,促使军粮配拨中央化,军粮补给流水线化。1940年以后,国民政府中央层面控制军粮预算、结算与收拨、调配权,补强抗战初期的后勤体制,以期真正实现军粮实物发放。

首先,1940年以后,由于自上而下推行田赋征实办法,国家以收粮代替收田赋,较之前得以囤储更多粮食实物^④。因此,国民政府中央结合当年征粮购粮情况与军队驻地、人数等情况,统筹调剂配拨。例如,1943年,财政部、军政部与粮食部三部曾联合向蒋介石递交一份签呈,提出该年度军粮配拨意见:“(军粮)按六百万人配备……以十分之九约五百四十万人筹拨现品,其余十分之一约六十万人以拨款委购为原则……凡属有粮可以利用之处,尽量配备现品,其实在无粮可拨,或游击地区交通阻隔,实在无法由后方追送者,始列为拨款委购。故核议结果,现品部分,共计配备米10751000大包,折谷29320000市石,又麦6797000大包,折合9710000市石,可供五

百四十七万一千人之用。”随后,该签呈又分省计算军粮配拨量^⑤。假如某战区或某省份需要在既定配拨计划外调剂,则须直接向中央甚至蒋介石本人申请。1940年底,广东方面李济深曾专向蒋介石表示,粤地军队粮食奇缺,希望中央在预算外增加拨款或粮食实物的发放^⑥。可见,军粮调配的权力已在相当程度上集中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相应机关。

其次,1940年,国民政府新设军粮局,专司军粮调配。制度上,粮政部门推行粮食的征实、征购、征借,所得粮食一部分归军粮,交军粮局核算控制。军粮局再将军粮实物转交兵站,由兵站输送给前线部队。军粮的流转大致经过粮政部门→军粮局→兵站(后勤)→军队的过程^⑦。此前,后勤部下辖各级兵站径直接收军需署移交的屯粮,而军粮局建立后,粮食征购与军粮交送部队之间由军粮局计划、把关、转交,减轻了兵站的部分压力,使其更专注于补给野战军队。

至此,国民党军在制度上已初步建立起了一套符合近代化军事理念的后勤体制。军粮由战前就地征发改由后方办理,向后方追送;军队不必参与军粮的征集、移交、补给诸环节,一方面防止军队直接向地方索取,减少军队与地方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可使军队专心于练兵、作战。军粮局的设立,在纸面上,加强了后勤体制的纵深,进一步凸显了后勤流水线作业的特点。此外,军粮配拨权力真正归于中央,也便于有计划地统筹与调剂。

二、后勤体制下国民党军军粮补给的困境

1940年,围绕军粮补给的后勤体制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中央化,并且,较之战前无计划无规律的就地筹措,此时的军粮补给流程更加符合近代军事制度与理念。然而,这套看似先进合理的流水线作业体系却不断失灵,弊病丛生。1940年后,军粮补给缓慢、军队缺粮反而更为普遍。

国民政府在军粮配拨上采用的是符合近代国家治理思路的统筹收支办法。军粮作为重要战略物资,在战时物资短缺的情况下,由中央统一预算与调配,在中央层面确定分配数量与地域后,再通过后勤系统向前线部队分别输送。然而,这种中央集权的近代国家治理思路,很难在当时的中国得到真正落

实。尽管1940年以后战线沉寂,军队调动极少,军政部能够在后勤补给与调度上作初步预判,但是国民政府无力对各地粮食产出与征购量、军粮的运输、补给的行政交接手续,以及各种难以预见的变化与本地化经验,作出符合实际的估算。于是,落实到具体执行环节,往往与中央层面清晰的计划相去甚远。

后勤体制的框架成型后,中央政府按照制度勉力计划与配拨,但是地方粮政部门、军粮局、后勤部下级的各级兵站,这三个分属不同系统的机构在军粮补给事务上难以协调,远超国民政府中央所能控制的范围。

在粮政部门与后勤部门之间增设军粮局,实行田赋征实办法,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军队直接购买粮食引起的弊病,缓和地方与军队之间的矛盾^①。然而,田赋征实加剧了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物价飞速上涨后,官定米价离市场米价相去甚远,使农民生存日益艰难,以各种手段消极对抗过度催征^②。采购军粮的矛盾能转移到地方政府与民众上,地方政府同样能将这棘手的问题抛还给军队。譬如,抗战时期,第五战区部分辖区处于鄂北地区,而第五战区军队在鄂北的粮食征集问题上与湖北省政府冲突不断,军方指责政府不负起征粮的职责,而政府指责军方过度索求,使民众无以生存,以致蒋介石亲自介入调解此事,终以湖北省政府屈服于军方要求告终^③。湖北省政府与第五战区军队之间在鄂北出产粮食量与存粮量上有严重分歧,双方各执己辞,蒋介石与军事委员会最终也没能下定论^④。

假如粮食能够如期足量征得,如何将之快速送达军队手中同样关键。军粮局未设立时,补给运转已捉襟见肘,军粮局成立后不仅未实现期待中的流水线补给,反而进一步使手续混乱,权责不明。1940年后,不仅粮政部门无法按时拨交军粮给军粮局、兵站,而且军粮局、兵站即便有粮也常常不负责输送,徒使军队消耗战斗兵专门领粮。所谓“军粮补给”毫无补给可言,往往需要部队官长灵机应变,提前筹划,否则很可能陷入枵腹而战的窘境。1942年,军政部炮兵第二补充兵训练处处长彭孟辑报告,该处先是由地方政府发拨粮单,令部队“自行向民间洽取”,

而“米质不良,添水添沙等事遂致发生,米质劣变米量因风燥减轻及营养不足之现象,在本处固因军食刻不容缓急不暇择,而驻在地地方政府督征不力,实其主要因素也”。1942年1月起,该处军粮改由驻桂军粮局第十仓库直接拨发,开始尚能勉强应付,每次拨交有10日左右延期,但不出三月便延期一月都未拨米一粒,四月后只能往返宜山、来宾两县搬运^⑤。在国民党军各现役野战部队与后方补充队部中,炮兵补训处的补给水准似在一般以上,即便如此,该炮兵补训处还要在地方政府、军粮局之间来回交涉奔波,兵站更未能尽到输送职责,可见部队军粮获取之难。军政部第十三补充兵训练处的军粮补给情况也类此。1942年五六月,该处由兵站第十三派出所将1940年的囤粮拨给,“多属霉坏虫蛀,并间有掺杂石灰,不堪食用者”,6月以后又改由永春县补给,但很快又“将感不敷”^⑥。更有甚者,每次军粮拨补需要在各机关间往来电文数次,往往军政部批准拨粮的电文已达,“而发粮机关,邮寄文书,姗姗来迟,甚有延误一月时光者”,“文电交驰。费尽周折,仍未拨到军米”^⑦。

部队长官丁治磐的日记中有较丰富细节。1940年,丁治磐对兵站运输补给颇有微词,强调“战斗间可数日无弹,而不可一日无粮,办兵站者应明了此义”。负责补给丁部的兵站运输能力之弱,令人瞠目。据丁治磐称,“兵站之运送船以起卸之无组织,装卸力减少,致两日之运送时间延长达六日以上”。丁治磐派兵前往领运,70里山路往返5日,反较兵站输送为快。兵站运送效率之低下,使丁治磐不得不将其部队移驻至距兵站一日往返时间的地点,以提高补给军粮的效率^⑧。作为野战师师长,丁对国民党军后勤的缺陷深有体会,认为后勤不良极大地影响部队战斗力,因为“以本师言,一切后区前送之事须自派兵员,其范围远及于重庆、夔、万、巴、宜,人力财力皆须出之师内,指挥教育之心纷于管理……尤以近日兵站发米须打折扣,地方食粮缺乏最为萦心”^⑨。

军需署曾有专文暗指兵站在运输军粮上的不负责。按理兵站本应以军粮仓库为兵站基地,各地军粮局便无须远距离交运到兵站末地;同理,兵站末地

与军队交接之距离原则上不超过16公里,作战军队无须承担长途运粮之苦。但是,实际上,“今兵站未能遵守此项原则,竟以兵站总监部所在地为基地,而兵站未地距离部队常在数日行程之远方,以致各地军粮局与部队运粮之困难,同时发生”^⑧。国民党军建立后勤体制,原本希望借助兵站,实现军粮补给的机动性与组织性,而在实际执行中,兵站却成了阻碍与限制机动性的赘疣机关。

于一地驻扎、活动范围有限的军队获取军粮尚且如此,长途行军时将更为艰难。依照兵站补给办法,部队长途行军、作战,兵站要跟随部队行动,专业术语即为“兵站追送”。兵站携带补给一路追随,解决军队移动过程中吃粮、用弹的后顾之忧。但是,要求现代交通工具严重不足的国民党军兵站,靠民夫运送大量弹药粮秣,随同部队行军,实属困难。1940年以后,兵站体制有所变化,采取地区制补给办法,兵站不再追送,而是专门负责进入其管区部队的补给。此办法一方面更加贴合前近代社会运输力低下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战线逐渐沉寂,军队主动攻击减少的缘故^⑨。曾经以在校生身份从军的黄耀武便回忆说,当时行军途中,伙食反而有些好转,沿途从兵站曾领到加工后的细米^⑩。

不过,由于黄耀武参加的是学生军,待遇可能优于一般部队,丁治磐的记录则透露出另一面相。1942年,浙赣会战爆发前,丁部依军委会命令由湖北长途奔袭至浙赣交界处。行军沿途,丁治磐不仅要思考作战计划与行军宿营等问题,还要亲自谋划军粮问题。1942年4月,丁治磐部行至江西宜春附近,因未提前考察存粮地导致部队浪费行军时间,为此,丁治磐颇感懊悔:“慈化粮食有米数十万斤,谷亦数十万斤,此在调查工作之未周,否则取道澄泽江于慈化补给三日份粮食,则行程可缩短半天。”丁治磐批评部队内办粮人员之粗心,认为提前调查地方存粮乃其基本职责:“金瑞亦积米40余万斤,可供本军十天之用,且甚愿过境军队之使用……办粮人员及先遣队等不加之意,使部队绕道上栗市,诚为错失。”^⑪丁治磐每到一地便要调查地方谷仓存粮,考察一地市面上之粮价,还要令下属预知存粮地,以规划行军路线,根本未见兵站有助力之处。

1944年,驻华美军为改善驻滇国民党军的军粮,曾由美军“口粮采办委员会”(Ration Purchasing Commission)提供粮食,希望由中方的兵站粮仓将美方采办的粮食送交前线部队,而中方兵站却不愿配合。为此,美军只得绕开兵站,超出既定职责范围亲自送补。可见,兵站已沦为粮食仓储机关,丧失了后勤补给机关本该有的机动性^⑫。

不仅兵站未能发挥应有作用,新成立的军粮局很快也沦为文牍流转的机关。1942年8月,白崇禧视察第一、五、八战区军粮情况后,向蒋介石报告道:“军粮局原由省粮政局按量分县摊征,集交军粮局,按期分配,转拨兵站运输补给。结果,不能按量征集,依期拨交,仅由军粮局发拨粮凭证,交由部队向各县催索,而各县则指向各乡、保推缴,不独妨碍整训,即纪律亦难维持,多数之军,且无隔宿之粮,万一有事势必影响作战。”^⑬为此,蒋介石致电孔祥熙(财政部部长)、何应钦(军政部部长)、俞飞鹏(后勤部部长)、徐堪(粮食部部长),严厉批评粮政部门不能严格按照田赋征实办法,按量按期征集军粮。蒋重申一定要按照制度规定,“以后各省应严令各县将应缴粮食依规定在预定日期以内,由省府飭各县负责,以实粮缴交粮政局所指定之地点,粮政局更应尽其本身之责任,将粮集中以后,分别送至与军粮局协议之地点,军粮局则应妥为配交各兵站,由兵站部向前方兵站所在地输送,交军队接收”^⑭。然而,此番重申并不能改变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严重偏差,各部仍是各行其是。

兵站、军粮局、粮政局分别隶属后勤部、军政部与粮食部。国民党内系统不同的机构,互相沟通往往效率极低。军队在某地补充粮食遇到困难,如果选择走程序,拍粮电报往往要在三个机构各层级之间流转多日,而军队又不可一日无粮,因此,军队在民间自行采买也有不得已之处^⑮。

机构之间文牍往来迁延时日已严重耽误军粮补给,而更严重的是各部之间推诿塞责,国民党内不能合作的毛病在军粮补给上同样突出。1941年,河南省政府直接向蒋介石告状,指出豫省各粮仓验收人员借口延收粮食,浮收刁难、勒索舞弊之事层出不穷。蒋令侍从室去电后勤部部长俞飞鹏查明问题,

而俞飞鹏回复被告各粮仓均非后勤部所有,侍从室又转电军粮局查究。前后往电文牍数日,最后仅收到军粮总局局长严宽已飭驻豫军粮局切实查办的答复,此后再无下文^⑧。

军粮局与兵站互不隶属,互不合作,军民两方之间更是隔膜日深。省县政府往往无法过问军粮局、购粮委员会等各自配购数量、价格、运输、囤积诸项,还易被各方刁难,以致“地方赔累不堪,其因运输及人马给养之费用,竟逾原购粮价格数倍”,“既经购粮委员会派购,而驻军又复就地购买”^⑨。最终,1942年,蒋介石因军粮局已成“赘瘤机构”,决定将之撤销并入粮食局^⑩。

然而,粮食部与兵站之间拨粮、运粮、存粮的低效依然未能解决。1944年底,魏德迈在考察国民党军军粮后勤补给系统后认为,其最大弊病在于购买、分配粮食的机关过多,但这些机关又不能负起各自的责任,可谓一语中的。尽管军政部方面对此批评表示原则接受,但仍要求保留后勤兵站系统,以便军方在地方谷仓无粮时有办法自我调剂^⑪。

三、军粮补给困境中的国民党军士兵温饱

军粮补给关乎军队之生存发展,稍有偏差,大军便会隔宿无米。落实到每一位士兵,能吃到多少食物,又关乎士兵的健康、体力与精神状态^⑫。国民党军后勤补给运作的失灵,使前线部队士兵温饱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极大地影响国民党军的战斗力。

战前,陆军大学校曾对军粮主副食标准有过粗略的研究。据陆大教员调查,德国陆军战时给养定量(每日)为:(甲)战时口粮:面包750克、肉375克、豆250克、脂肪60克、咖啡25克、食盐25克,共计1.485千克;(乙)携带口粮:重烤鸡蛋面包250克、罐头肉200克、罐头菜150克、咖啡25克、食盐25克,共计650克。日本陆军战时给养定量(每日)为:(甲)完全定量:精米640克、精麦200克、罐头肉150克、食盐12克、酱油20克、干菜渍物及调味品375克,共计1.397千克;(乙)携行定量:精米640克、精麦200克、罐头肉150克、酱油20克,共计1.01千克。比照德军、日军军粮标准,陆大教员认为,“东西洋人体格不同,德国之定量固不适用于中国,即吾国之阵中要务令……完全采用日本之成规,亦未见诸实行”。给养较为充

沛的税警师(编制11000人),每月需大米2300包,根据不同计算标准,每人每日消耗大米仅585~665克,其他各部队标准之低则可以想见。至于副食更无标准,只以副食代金2分为常规做法。该教员最后总结认为:“若将来对外作战,(副食)恐仍须发现品也。然无论副食品为咸菜或发代金,仅此决不足以维持官兵之营养,至少须加咸肉或罐头肉150克为要。”^⑬

由上可知,首先,仅以纸上标准,德、日军队口粮给养的主副食定量高、种类多,中国军队不仅没有统一标准,而且即便是精锐部队的米(面)主食消耗量也低于德、日军队;其次,陆大研究人员也清楚,仅以主食供应绝不能满足士兵作战之体力消耗,他们期望未来能加发咸肉或罐头肉,使士兵能同德、日军士兵般有足量蛋白质、脂肪的补充。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士兵的主食标准在22~24两(旧制两,16两为一斤)上下,尽管低于德、日陆军多年前的标准,但只要足量分发,仍不会使人饥饿。副食方面,基本是全部发放代金(菜金),而1940年物价高涨后,微薄的代金便难以维持士兵日常副食摄入。抗战头三年,国民党军士兵在吃上似乎还能勉强应付。有人回忆1941年可作为分水岭,1941年以前物价上涨还不严重,一般士兵每日三餐菜虽不多,饭仍可吃饱^⑭。物价上涨后,米、面主食都捉襟见肘。

单以主食论,由于整套军粮配拨与后勤补给体制弊病丛生,军队能否足量获取定额已成问题。购买、分配、补给粮食机关过多,“多一只香炉多一只鬼”,只要其中每个环节稍加克扣、贪污,甚至是无意中的损耗浪费,最后送至军队手中便会大打折扣,士兵实际真正能够拿到手的远低于标准。张发奎发现田赋征实环节,“民众送粮到收集站时会遇到各种困难,县府会说粮食太湿,或者说米质欠佳;还有一个计量的问题。县府会责备农民所交粮食缺斤短两。所以每缴100斤粮就要带备110斤防范官府刁难”,县府“送米到兵站时,也会被指责斤两不足。有些亏空数可能是在谷仓里被老鼠吃掉了,因此,县政府送粮时也需要比定量多些”^⑮。而盘剥手段更是花样百出,以兵站为例,知情者透露可贪污舞弊之法有:(1)兵站补给“米盐的重量一般用大秤或磅来衡量,每包米或盐(200斤)秤入时可以作弊秤少一二斤,秤出

时也可以作弊多秤一二斤,这样每包米或盐可以作弊二至四斤”;(2)“把明天要补给的米放在潮湿地上”,“秤出时每包可以多四五斤不等”;(3)“每百斤米由甲地运到乙地时,按上级规定可以报销途耗百分之零点七五,还是可以盈余一半的”等,不一而足;(4)“(兵站)收粮的时候,严格要求稻谷晒到很干,风得很净,否则拒绝接收。可是上报加工情况的时候,总是说老年陈谷,不干不净,每百斤谷仅可碾米69斤”,甚至更低,而实际一般可碾米70斤^⑤。

即便在各环节不被盘剥,中途搬运也有许多无法避免的损耗。丁治磐指出,他派士兵往返数十公里领粮,沿途风吹雨淋,搬动散落就有消耗,并且运输士兵食量会增加,也在无形中增加军粮消耗。规定24两米,如足量拨补确实能够足食,但因各类损耗,实际需要26~28两才能满足^⑥。除却逐级补给中的贪污与非人为损耗,士兵真正吃到米面之前,还可能被部队长官、经理人员盘剥一层,中饱办法亦是层出不穷,不胜枚举^⑦。1938年初,军需署统计自卢沟桥事变以来,购粮300多万包,据此推算全年度可购粮600多万包^⑧,而抗战第四年度(1940年7月-1941年6月)总计征购军粮大米10826250大包,小麦8100000大包,共近1900万大包^⑨,所购军粮已是抗战初期的三倍之多,军队并未增加三倍,士兵吃饭却越来越难,可见中间环节各种克扣,有意无意的损耗之严重。

因此,无论是后勤拨补粮食,还是军队自行采购,最后士兵能吃到的米面少得可怜,其质量也是极为低劣。参军士兵黄耀武个人体会是,从军后最不能适应的便是伙食,“吃的是糙米,稻壳磨掉了,但还是很粗糙,很硬,有的是掺了稻子、稻壳、沙子,到胃里不消化。定量每天一斤半,去了杂物后,实际只有一斤二三两,许多人吃了以后都泻肚。我的脾胃差,吃好吃赖不要紧,但是我吃不了糙米,不去皮不消化,老拉肚子。但既然来了,不行也得行,慢慢吃慢慢适应,咬牙啊”^⑩。而在黄仁宇回忆中,士兵甚至根本无法吃到大米、面粉,只能吃“玉蜀黍”,“每一粒都像是坚硬的石块,外皮硬到必须被磨成粉后,我们再就着水勉强吞下”^⑪。按照规定,国民党军每名士兵须携带五日份的紧急口粮,平日不准动用,战况紧急

或粮食紧缺时可保士兵生存下去。然而,实际执行情况堪忧,前往后方领粮的士兵都只能在路边找野菜充饥,可见口粮制度未能真正执行^⑫。米、面补给未上轨道,时常使前方军队为下顿发愁,而口粮制度如能严格遵照,至少有些缓冲。淞沪会战时,国内媒体还专就军队野战口粮(类似烙饼的干粮)作过宣传,但是此后再未见类似记录^⑬。抗战时期,米、面等无须多少加工的主食都不能充足发给,加工干粮也只是极少数特殊情况而已,至于日军、美军的罐头、压缩饼干等更是无法企及^⑭。

米、面之外的副食更为短缺。抗战后期,丁治磐作为军、师长,最为苦恼的并非作战,而是士兵的食物,而食物之中丁治磐又尤为操心副食。其日记中时常记录驻地附近菜蔬、肉类价格,甚至会考虑副食费使用情况。一切经理都需要军师长亲自操心,可见副食采办之难,已经影响到整个部队的基本生存状态。例如1942年5月27日,日记提到:“夜十二时军部亦到,展开后,山家甚少,宿营较为困难,粮食运输尤应积极,蔬菜甚少,惟竹笋可供饌。”1943年6月7日:“副食买不着。油菜柴等其价飞涨,遵照给与规定由地方限取得概当黑市之半而弱,如豆价每石千余元而限价400元,肉价24元限价12元,油价15元限价7元,人民自然蚀本,地方自难供应,遂致口惠而实不至,由乡开条拨保,由保拨户辗转催索。采买之兵变成催科之吏。”^⑮

1944年底,丁部因退防至贵州,与其他各军麇集贵阳附近,瞬时推高当地的物价,副食已无法购得。1945年4月19日,丁治磐不无忧愁地叹道:“兵食无蔬,到处采蕨、采马兰、采野芹以佐餐。柴价太高,无力以致之,辙借民家镰割刈以烦,故宿营到达时间不可不顾虑此,须使提早。余见兵食之艰真觉不餐亦可。”此前,1944年3月,士兵的副食补助费提高至每人每月150元,当时丁认为“必使士兵每月能食肉一斤,并决定以三月三十一日驻在地之肉价为标准价”。但是物价上涨速度已难以控制。1944年底的贵阳,12月13日青菜20元/斤,肉130元/斤,而12月15日,青菜涨至25元/斤,肉150元/斤,年初定下的150元副食费早已不能满足。半个月后,贵阳附近一般士兵生活费已要6000元左右,但是副食费直至

1945年3月才涨至860元,完全无法补贴日常副食及其他消耗^⑥。而且,这还是在士兵的副食费不被各个经手人盘剥的情况下。驻华美军的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士兵经常得不到仅有的副食费能买到的食物,运气好能得到小部分。这些钱要经过太多手,只有小部分真正给了士兵或花在采购上^⑦。

因此,国民党军士兵寥寥无几的副食代金所能采买的食物甚至不能保证基本生存需求。他们往往要自采野菜,以补充维生素等营养。黄耀武刚入伍时就是靠老兵手把手教,辨别哪些野菜可以食用,“我们一边行军一边采,到达宿营地把野菜洗干净用开水焯一下,放点盐就可以吃了”^⑧。艰苦之情可以想见。丁治磐也曾用诗句刻画士兵无菜可食,只得休整间隙上山采野菜场景:“厨番饕看邻家脯,正要登山采蕨时。”^⑨更为无奈的是,连烧水煮饭必需的木柴由于价昂,都需要在训练、行军之余与当地民众商量,免费砍得^⑩。

作为参与一场近代战争的士兵,原本只须安心对敌作战,学习武器技能、战术技巧,而后勤保障无须他们操心。而实际上,这场中日实力相差悬殊的战争不仅把农业社会组织机能的脆弱暴露无遗,而且使士兵面临食物严重短缺的悲惨境地。而即便粮食送到、买到,他们还要在原本可以休息之时,自行碾磨(丁治磐戏称为“碓磨上补给”^⑪)、烹煮,不仅占用大量时间,而且难以适应战场紧急情况^⑫。滇西会战后,参战军队自我检讨认为,敌我作战实力差距的部分原因是给养水准的巨大差距:“查敌军编制并无炊事兵之设置,每日食品之定量均由军曹按日分配至担任固守阵地之部队,则大部食品全以罐头、饼干为主,守兵既无断炊之虞,同时更无炊爨之累,士兵体力得以长久保持……反观我国军队必须由炊事兵挑运笨重之炊爨器具,在第一线后若干里地方将饭菜煮熟,再行送赴前线士兵,如被包围一日不得食,势必自动崩溃。”^⑬军队自行烹煮还有可能因为驻地卫生无法保证,造成士兵间疾病的传播。驻华美军便曾观察到国民党军某补充兵训练处,2000余名士兵都不同程度地患有营养不良症、肺结核和其他疾病,而这些士兵却只能紧挨着茅厕炊煮,卫生条件严重堪忧^⑭。

士兵长期饥饿,严重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导致抵抗力下降,国民党军士兵极易染上各种传染病^⑮。在长期饥饿状态下,吃食稍有不慎也会出大问题。黄仁宇生怕士兵偷吃老百姓的狗,担心极端饥饿状态下大吃大喝导致病亡^⑯。士兵温饱困难,不仅使其战斗力大打折扣,甚至连行军都成问题。1945年3月,驻华美军在调查士兵粮食问题时发现,驻扎贵阳附近的国军第13军短途行军都会导致大量士兵饿晕在路旁^⑰。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根据各方报告认为,“中国出现大部分军事问题的根源其实很简单,就是士兵得不到吃的。相较于枪支,中国军队更需要食物。长期的营养不良使许多中国士兵身体虚弱,无法行军,有的甚至死在路上”^⑱。士兵因饥饿而逃亡更是屡见不鲜^⑲。

抗战末期,美军曾参与部分国民党军的后勤补给工作,这些部队的军粮伙食得到一定改善。当时,美军在大后方曾一共设立6个美军口粮采办委员会,协助补给驻军与过路军队口粮,一共补给了185000名中国士兵的伙食。据口粮采办委员会负责人科尔尼上校(Colonel Charles Kearney)称,贵阳的13军士兵在受补前虚弱得无法行军,但经过数月改善军粮的努力,到1945年8月,13军是一支“体力充沛的,行军整齐的军队”。不过,美军协助国民党军补给,受惠的部队毕竟是少数,并且当最后一个口粮采办委员会在昆明附近设立时,抗战已接近尾声^⑳。

四、余论

1943年,在蒋介石官邸召开的一次小范围汇报中,蒋介石强调全军军粮预算量必须加以限制,不得超过450万人的吃粮量。其理由是部队缺额太多,再增加只会“糜饷糜粮”^㉑。对此,财政部、军政部与粮食部三部共同意见是,1944年军粮必须以600万人的军队为标准,540万人发实物,60万人发购粮经费,较蒋介石的要求多出150万人^㉒。

实际上,军粮配拨款收归中央后,国民政府处理军粮问题的思路便是上层按照简化模型将复杂问题“削足适履”。解决复杂的军粮问题似乎只要在统筹收支量上加以调整,便可节制浪费,一劳永逸地解决部队粮食问题。无论是谋划全局的蒋介石,还是作为实际执行机关的财、军、粮三部,都仅着眼于“宏

观”上的数据。实际上,军粮配拨的研讨只是军粮补给中最简单易行的环节,中间各补给机关间的联络,粮食运输环节中的复杂因素,以及前线军队官长的措置与道德自律等,都会极大地影响军粮补给成效。后方大员在重庆办公室中依赖不可靠的数据估算出的配拨量,根本无法适应前方补给的实情。

蒋介石也并非浑然不知其中“关节”所在,他甚至相当注意中下层具体的实施环节。在蒋看来,中央粮食配拨计划并无大问题,后勤补给体制也清楚了,问题出在执行过程中脱离轨道,尤其是前线部队长官中“吃空额”的贪污行为。1944年,豫湘桂战役惨败后的整军会议上,蒋介石严厉指责军粮补给是“笼统军需”,是“亡国计算法”。蒋介石认为一味提高军粮配拨与军费并不能解决士兵粮食的匮乏问题,而从现有浪费、贪污上着手,至少还可节省出十分之二^②。蒋介石坚决反对吃部队缺额来维持官兵生活,认为这是饮鸩止渴的做法。他强调如果不能在核实部队人员基础上,将粮饷发到每一位士兵的手中,军队补给便永远不能健全^③。

但是,蒋介石的这一判断同样以偏概全。部队“吃空额”固然是越轨行为,但是整个后勤补给的失灵,军粮运送的严重迟滞,甚至毫无补给全靠部队自行筹划,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催生了部队“吃空额”来换取足够的生存资源。然而,蒋介石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与整个军粮后勤体系的层层盘剥相对抗。更为致命的是,国民政府勉强建立的自上而下的科层体制,是中央庞大、下层虚弱的倒金字塔型,无力厘清补给中间流程的各种漏洞与各方的矛盾掣肘。

抗战爆发后,国军的军粮补给与其他诸如武器弹药、军装被服等都被纳入自上而下的后勤补给体系。以各级兵站、军粮局为支点,国军在制度上初步建立起了一套符合近代化军事理念的后勤体系。但是,这套在西方近代国家颇为适用的后勤体制在前近代的中国农业社会过于“超前”。后勤基础并不在军事,而在近代工业化,需要整个社会高度的组织力、动员力与科学技术的支撑^④。1945年上半年,驻华美军曾参与到中国军队的口粮补给中,即便是拥有丰富后勤补给经验的美军也苦于如何将易腐的肉类送至前线,“因为中国农村没有冷藏、交通与储藏

设施”。最终,美军亲自上阵参与补给,只能运送或驱赶着未宰杀的牲畜至前方^⑤。此即是近代补给体制与技术无法适应前近代社会的佐证。

在补给体制、补给技术之外,后勤更需要国家机器组织力与动员力的支持。国民政府在战时不断扩充其机构,在重庆中央建立了庞大的科层制组织。涉及军粮征集补给的机构,先后设置了军需署、后勤部、粮食部、军粮局。各部门表面上分工明确,环环相扣,却始终无法有效联系、通力合作。蒋介石与国民政府高层分权负责的行政思路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各机关组织力薄弱的表现。军粮补给中央化后,由上而下涉及的环节远超战前部队就地补给,粮食征购、运输、统筹,无一不需要国家强力嵌入基层社会,发挥其组织力与动员力。而国民政府的上述部门却大多深陷“文牍主义”与相互间矛盾冲突中不能自拔。令人遗憾的是,抗战进入尾声之际,一位县官不清楚本县有多少粮食、副食产出,征购粮食拨补军队,全凭感觉、运气与当地民众对驻扎附近军队的观感^⑥。基层连最基础的产量与供给能力统计都是一本糊涂账,上层设置再多的补给机关,军粮补给也不可能有切实保障。

与国民党军后勤补给制度截然不同的是,抗战时期,中共军队所需粮食则通过供给制补充。尽管,后勤补给制度比供给制更利于部队大范围调度作战,部队也不必倚靠作战地域本身物资多寡,但是,中共军粮供给制做法恰恰更适于敌后根据地的生存发展。抗战时期,中共部队活动范围有限,所在地几乎都是物产匮乏的地域,却能通过强组织力,最大程度地提高粮食征收、存储与调拨的效率。在根据地内的巩固地区,“公粮都由政府屯积,部队不用亲自缴收”,而部队行动时“流动支粮证在各村公所都能支取粮食”^⑦。没有后勤兵站等支援,中共部队却能依赖基层政权做到“随走随吃”^⑧。根据地党政军的一元化,更将军粮问题与各层级各机关的日常动员工作绑定在一起。军粮工作并不是通过简单的公文传递、数字统计即可完成,而是需要党政军民与农村基层面对面,具体问题具体解决^⑨。而这些细致入微的工作,与国民党地方军政系统的无所作为形成鲜明对照。

注释:

①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570-572页。

②有关国民党军军粮的重要档案资料有侯坤宏编:《粮政史料第六册军粮、战后粮政、统计资料》,台北:“国史馆”,1988年;“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国军后勤史》第4册,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0年。相关研究有吴敏超:《战时军粮谁承担——以国统区叶集军粮案为中心的探讨》,《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1期;陈默:《战时地方的军、政对立——以第五战区与湖北省府的关系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3期;刘树芳:《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陆军粮政述论》,《军事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③郝银侠:《社会变动中的制度变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侯坤宏:《抗日战争时期粮食供求问题研究》,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年。

④Roger Chickering, Dennis Showalter and Hans van de v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ar, Vol. IV War and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266-267.

⑤徐永昌:《求己斋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02页。

⑥白崇禧:《后方勤务会议训词》(1938年3月),《军委会后方勤务会议大会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军政部全宗,七七三一—46。

⑦《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册,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461页。苏圣雄的研究表明,国民党军兵站制度源自日本。一般兵站制分为部队制与地区制,日本为便利境外作战,采部队制,其利在补给机构与受补给部队关系密切。1940年以前,国民党军也大抵以部队制为基础作了适度调整。苏圣雄:《改革与困境:国军后勤补给制度的变革(1944-194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7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0年,第99页。不过,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国民党军为国境内作战,不首选地区制而以部队制行之多年,是因为后勤补给体制仍在初创之时,未形成前后方的立体机制。还是因为军队仍各有历史渊源,无法灵活补充?还是两者兼有?

⑧《抗战中期第七战区军粮补给情况》,《李洁之文存》下册,梅州:广东省兴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1990年,第144页。

⑨“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国军后勤史》第4册上,第213页。

⑩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回忆道,抗战初期,他的军队所吃粮食,便是“由中央付钱给四战区兵站,兵站再通过当地

政府购买大米。战区兵站将大米分发给长官部及军级单位”。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记录:《张发奎口述自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219页。

⑪《蒋中正电徐永昌冯治安令河北各县长负责屯积粮米须存足三个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20300-00008-058;《蒋中正电俞飞鹏平汉与津浦两路至少运足前方所需粮秣四个月以上》,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20300-00008-059。

⑫周骏彦:《军需工作经验报告》(1938年3月),《军委会后方勤务会议大会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军政部全宗,七七三一—46。

⑬“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国军后勤史》第4册下,第694、698页。

⑭军需署职员赵抡元在一篇检讨文章中谈道:“在前线战区里……采购实感困难。军队中最主要之采购,则为食品,此等食品,本应由兵站发给,便以兵站方面各种困难,仅能发给大米或面粉(甚且大米面粉亦改发现金),其他副食物及马秣,概由各部队自行采购,理由是兵站没有现品。”赵抡元:《第二期抗战中军队经理如何充实与改进》,《军事杂志》第113期,1939年4月25日,第21页。

⑮“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国军后勤史》第4册下,第730、750页。

⑯如1939年8月25日日记:“十里铺附近米价每石七元五角,重约合市称一百七十斤,每兵每月约需米二斗五升(即1/4石),不足两元,柴约六角,菜约九角,柴价每斤一分至二分。”诸如此类并不少见。《丁治磐日记(手稿本)》第1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190页。

⑰《丁治磐日记(手稿本)》第1册,第126、315页。

⑱赵抡元:《抗战以来我国军队经理之检讨》,《军事杂志》第119期,1939年12月15日,第30页。

⑲当然,1940年以后粮价飞涨的原因极其复杂,是多重因素综合导致的,本文不再具体展开。

⑳有关田赋征实政策的研究,参阅郝银侠《社会变动中的制度变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研究》、侯坤宏《抗日战争时期粮食供求问题研究》。

㉑《财政军政粮食三部等呈三十二及三十三年度军粮配拨意见》(1943年),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87210-0001。

㉒《李济电蒋中正七战区军食问题经召集会议决定根本解决及目前补救办法》(1940年11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526-096。

㉓《军粮拨发与交接办法》(1941年),台北“国史馆”藏,行

政院档案,014-040504-0011。

②④张发奎回忆指出,田赋征实后,战区内部队便直接与省政府打交道,“我告诉省政府部队需粮总数后,它就命令每个县向附近的军级兵站缴送一定数量的食米”,“军队不再被卷入买米时与民众的冲突”。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记录:《张发奎口述自传》,第236页。

②⑤侯坤宏:《抗日战争时期粮食供求问题研究》,第71-78页。

②⑥陈默:《战时地方的军、政对立——以第五战区与湖北省府的关系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3期。

②⑦《湖北省购拨五战区军粮有关文电节要》,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008-010901-00040-001。

②⑧《军政部炮兵第二补充兵训练处工作报告书》(194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政部全宗,七七三一—44。

②⑨《军政部第十三补充兵训练处三十一年度上半年工作报告》(1942年7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政部全宗,七七三一—44。

②⑩先纪斌:《两个月军粮经理记》,《陆军经理杂志》1941年第1卷第6期,第81页。

②⑪《丁治磐日记(手稿本)》第2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172-175、177页。

②⑫《丁治磐日记(手稿本)》第2册,第255页。

②⑬吴达成:《军粮运输情形及今后改进意见》,《陆军经理杂志》1941年第2卷第5期,第49页。

②⑭“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译:《国军后勤史》第4册下,第1050-1056页。

②⑮黄耀武:《1944-1948我的战争》,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9页。

②⑯《丁治磐日记(手稿本)》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176页。

②⑰ Rpt, Food Dept, Hq SOS, Supreme Hq, Chinese Army, Supplemental Food Section History, 9th Oct 1945, 转引自 Romanus and Suth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 Washington, D.C., 1999, p.242.

②⑱《白崇禧电蒋中正何应钦视察一五八各战区呈报军粮兵役之缺失》(1942年8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106-00016-201。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也有类似记录,“第五战区无隔宿之粮。粮政局无粮,只好发票与军粮局,该局转发兵站,兵站转发部队,部队只好向人民要,军民交困而坏纪律”。《徐永昌日记(手稿本)》第6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475页。

②⑲《蒋中正致孔祥熙等电》(1942年9月10日),台北“国史

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106-00002-093。

②⑳《林蔚电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为各粮政军粮两局分立之弊并请将军粮局并入粮政局》(1942年10月31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典藏号:001-087000-00015-003。

㉑《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部长俞飞鹏电委员长蒋中正》,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典藏号:001-050000-00006-010;《军政部军粮总局局长严宽电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已飭驻豫军粮局切实查办豫省购运军粮给价短少大秤浮收弊端》,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典藏号:001-050000-00006-009。

㉒《河南省民政厅长方策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为谨就管见所及屡陈豫省应谋改进之事五项如应速行财政收支系统法及改善购运军粮办法等》(1941年2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典藏号:001-050000-00006-001。

㉓《蒋中正电何应钦取消军粮局改由粮食部拨全国军粮至各战区或兵站部》(1942年5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70200-00024-091。

㉔《魏德迈参谋长建议改状况部队给养案小组会议纪录》(1944年12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典藏号:008-010706-00033-001。

㉕黄道炫有关中共根据地日常生活研究,已经触及战时环境下军民的粮食与温饱问题。黄道炫:《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日常生活》,《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国民党军与国统区在饮食方面的日常生活研究较为零散,参见侯坤宏:《抗日战争时期粮食供求问题研究》,第123-134页;郑会欣:《抗战时期后方高级公务员的生活状况——以王子壮、陈克文日记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2期。

㉖陆军大学校田见龙编:《关于粮弹补给之基础的研究》,南京:军用图书社,1935年,第23-28页。

㉗谭继禹:《戎马琐忆》,第61页,转引自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年,第95页。1940年初,丁治磐还认为抗战以来人粮并不缺乏,惟马粮筹购不易。《丁治磐日记(手稿本)》第2册,第65页。

㉘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记录:《张发奎口述自传》,第236页。

㉙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4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0-451、455页。

㉚《丁治磐日记(手稿本)》第3册,第397页。

㉛参政员褚辅成曾在提案中指出:“自军需局至特务长,层层克扣,量已不足,犹复故意掺石,并缩短吃饭时间,限制吃饭碗数,使其咸有饥而不得果腹,食而不能下咽之苦。”《改善

士兵生活》，《李公朴文集》下册，北京：群言出版社，2012年，第937页。

⑤周骏彦：《军需工作经验报告》（1938年3月），《军委会后方勤务会议大会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政部全宗，七七三一—46。

⑥军政部编：《抗战第四年度军政统计提要》，第62页。

⑦黄耀武：《1944—1948我的战争》，第16页。

⑧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年，第9页。

⑨《石觉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第201页。

⑩《战时军粮·标准光饼》，《良友》总第132期，1937年12月15日。

⑪《罗友伦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311页。

⑫《丁治磐日记（手稿本）》第3册，第198、397页。

⑬《丁治磐日记（手稿本）》第4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65—66、249—250、254、285页。

⑭Romanus and Suth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p.242.

⑮黄耀武：《1944—1948我的战争》，第19页。

⑯《丁治磐日记（手稿本）》第4册，第17页。

⑰《丁治磐日记（手稿本）》第3册，第498页。

⑱《丁治磐日记（手稿本）》第4册，第154页。

⑲第六战区作战检讨会议上，曾有部队长官报告士兵“忙于运粮、打柴，训练颇少”。《徐永昌日记（手稿本）》第6册，第68页。

⑳宋希濂：《第十一集团军滇西龙芒地区作战经过报告》，南京：陆军大学校印，1944年，第51页。

㉑Romanus and Suth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p.242.

㉒刘馥：《中国现代军事史》，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第153页。

㉓《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第9页。

㉔Romanus and Suth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p.245.

㉕Romanus and Suth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pp.64—65.

㉖丁治磐部便有士兵逃亡去附近民营工厂中当伙夫，“士兵生活愈艰，而逃亡愈多，本军之在重安江，士兵有感于民营工厂待遇之高，而逃去以充其伙夫者”。《丁治磐日记（手稿本）》第4册，第292页。

㉗Romanus and Suth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p.246.

㉘《徐永昌日记（手稿本）》第7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121页。

㉙《财政军政粮食三部等呈三十二及三十三年度军粮配拨意见》（1943年），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87210—0001。

㉚《徐永昌日记（手稿本）》第7册，第396—397页。

㉛《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年7月21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448页。

㉜Roger Chickering, Dennis Showalter and Hans van de v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ar, Vol. IV, War and the Modern World*, pp.266—267.

㉝Romanus and Suth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p.245.

㉞1944年底1945年初，部分驻华美军曾在若干农村调查、筹集粮食，他们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人在粮食食物上的统计并不存在，或者不可靠。县官为了避免过度征取，少报粮食产出，但是实际上“没有人真正知道（粮食产量）”。最后，中美双方达成共识，要想从农村中获取统计之外的更多的食物，只能通过合理定价，停止军队有组织的搜刮与随意没收。Romanus and Suth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p.245.

㉟《太岳纵队一九四二年供给工作总结》（1943年4月），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5册，北京：金盾出版社，1992年，第380页。

㊱八路军干部刘荣便感叹“公粮制度特别好，不论到大小村庄都给军队准备好粮食、柴和菜，军队能够自由轻装转移打游击，可以不带粮食，哪里都可以吃到饭”。梁山松、林建良、吕建伟编：《烽火晋察冀刘荣抗战日记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83页。

㊲新四军五师在考虑给养问题时，强调“党政民工作暂时停止，从党委起大部分散到最下层”，“注意帮助部队解决财政给养问题，把一切为着战争胜利的精神，贯彻到各级工作中去”。具体做法也是“先调查后列名单，指名借募”，每甲不超过三户，态度强硬地向大地主说服要粮。《五师关于解决给养办法的报告》（1942年3月），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7册，北京：金盾出版社，1992年，第82页。